

## 培育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政策选择

文/季婵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社会转型期。而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特别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壮大。所谓中间阶层，从收入来看，就是介于高收入基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处在中等的阶层；从职业来看，大多指得是从事非体力性工作的白领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从受教育水平来看，主要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目前我国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都不算高，特别是加上基数较大的农村人口以后，中间阶层的规模更为有限。可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没有呈现出稳定的结构化趋势即“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来培育、扩大中间阶层，这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政府主导型，中间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推进的结果。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规模的，其发展壮大更多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国自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就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这就需要政府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合理公平的适于建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可以说，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当然现在相关的政策措施有很多，像税收政策（调高、扩中、提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下面也是政府可选择的培育政策和机制：

一、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使人们在物质水平上能升入到中间阶层：

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中间阶层兴起的重要结构性条件。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这就是说，中间阶层要发展壮大，必须有一定的产业结构作基础。在我国目前必须加大调整社会产业结构力度，为培育中间阶层准备好适宜的产业结构空间。

另外，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壮大的中间阶层。东莞珠江三角洲等地，甚至在全国情况都是如此，工厂里的打工者的工资在20年间几乎都没有涨过。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雇主阶级认识到，为了推进生产、扩大内需，就必须将生产者变为产品的消费者。中国要想实现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只能是逐步提高受雇者（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不能片面的满足出口的需要，所谓的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一味压低劳动力的价格。

二、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使人们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实现向中间阶层的上升流动；

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像我国古有“科举制”（当然有其弊端，在此不作讨论。）现代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事实也证明，大学教育与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的趋势有密切关系，互为因果，大学已经成为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中间阶层与只有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低下的状态相适应。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状况还远远跟不上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要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并没有和经济的发展同步提高，而是把发展教育的重担转到了国民身上。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的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义务教育法定是免费的，但是2002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有1000万人；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为10%，部分地区高达50%。

纵观那些能迅速崛起的新兴现代化国家，在教育上都投入了超前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像日本、新加坡在二战后在艰苦的环境下政府仍投入大量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同样，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有人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的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

我国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更少，正是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过低，造成了乱收费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实际上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直到2003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也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

然而，即使这有限的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配又是很不合理的。据统计有77%被用于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得到23%的教育投资。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利用公民纳税所得而投资建设的公立学校，理应保障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现实情况是相当多公立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各样高收费门槛，拦住了贫困学生。农村学生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家庭条件方面都远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并且，还要面对高昂的大学收费，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这使得许多最需要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村、城市贫困学生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以至于有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列为“新三座大山”。教育资源分布和受教育机会极不公平，这样既不利于农村和贫困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农村和贫困学生的向上流动，向中间阶层流动。

总之，加快发展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国家有义务保证每一个青年，无论城乡，都能够接受起码的九年义务教育，让高等教育成为国民教育，面向大众，为各阶层的子女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为更多的人实现向上流动提供教育支持，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使大多数农民能够通过职业的上升流动逐步进入中间阶层。

目前我国尚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城市化的初期，所以现阶段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我们培育扩大中间阶层要面对的基本国情。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城乡的和谐，就没有中国的和谐；没有广大农民大量的步入中间阶层，就没有中国中间阶层的壮大，就形不成“橄榄型”这种良性、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两者关系紧张，没有和谐可言。

中国城市化和农民收入少是历史残留问题。但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城市还进行保卫城市的政策，在就业政策上倾向城市人口，城市人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村人却没有保障。目前，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的侵占强占农民的土地。众多失地农民已经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从道义说，中国的农村养大了城市，城市应该反哺农村，但是，现在没有，我们的城市化仍然是拒农村居民于门外的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是出现几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剥削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农村和农民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吗？这怎么使占人口比例70%的9亿农民成为中间阶层，从而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限制了城市化进程，限制了农民通过职业的上升进入到中间阶层，主要的制度性根源就是以“城市人”和“农村人”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2001年10月1日开始的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拉开了逐步扫清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体制性障碍的序幕。但在宪法这种最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上，我们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这将制约户籍制度改革的彻底性。所以，我们应当尽快把迁徙自由提上修宪的议事日程。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旦做出，可促进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理顺城乡社会关系，在政策体系上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可以预计，这样体制下所带来的全国性人口迁徙浪潮会不同于以往的民工潮，将为目前在城市打工的8000万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打开大门。

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工作，同时通过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人口从目前的70%左右降至30%甚至更少，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可以自由进出，这样才能突破中间阶层成长中的瓶颈制约，使社会中间阶层进入一个超常的发展壮大时期，最终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

（作者单位：衢州市委党校）

#### 相关链接

中国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及其实现形式  
培育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政策选择  
中部崛起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研究  
企业战略变革与构建和谐社会  
区域创新系统中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研究  
区域政府经济合作的背景分析与相关理论研究  
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